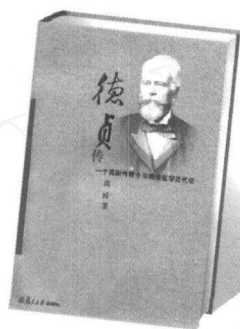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中西医的调人”德贞——高晞《德贞传》读后

李天纲



《德贞传》高晞著
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

“中西医之争”，是二十世纪文化史上的肉搏战。西方文化进来后，和传统儒家争，和本土宗教争，和王权体制争，讨论起来，都还属于“意识形态”的分歧，一下子难以验证。但是，“中医”和“西医”的论战，关乎器官，联系身体，或许生死，用语言和概念是掩饰不住的，必须分出胜负。治病吃药，必择良医；两军对垒，必分中西。

一般来看，“中西医之争”，常常是中医败下阵来。中国人几乎就是放弃了中医。一八三九年，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 (Peter Parker, 1804-1888) 在广州十三行新荳栏眼科医院给钦差大臣林则徐治疗疝气，立了一份编号为“六五六五”的病历卡，据说是目前所知的第一份“中病西医”记录。“医学传教”，先可以分开来说。如果说西方在中国的“传教”还不太顺利的话，那他们的“医学”无疑是成功的。在一九二〇年代中西医地位的讨论中，很少有人支持中医。鲁迅的态度最典型，他说：我“只相信西医”。他在《父亲的病》、《药》，以及《日记》中，不断表明对中医的厌恶。在《〈呐喊〉自序》中，更说“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”。

鲁迅之外,康有为、梁启超、严复、孙中山、胡适之、陈独秀等“西潮”人物,全都拥护“西医”,厌弃“中医”。中国人对西医的信任,也到了执著的程度。近年来,为争论“中医”的地位,有人重提梁启超在北平协和医学院被“割错腰子”的旧事,还有披露康有为死于德国医生做的“睾丸移植”之手术。康、梁师徒两人,至死不悔,力挺西医。这些官司,当时没有定案,现在查证颇难。但是,民国以降的“意见领袖”们,都是西医派,这是可以确定的。

与此相反,一百年前有一位从苏格兰来的医学传教士,并不否定中国的医学传统。他在《脉论》(1874)中,把西医的“血液循环”理论,和中医的“气脉经络”理论对照,实际上开出了一条“中西脉学比较”的思路。直到现在,中国的医务工作者,还在坚持从“气脉”、“经络”和人体“循环”理论的关系,来论证中医的合法性。一九七〇年代,上海医务界用现代医学理论,攻关“经络”学说。二〇〇七年,南方医科大学某国家八六三项目组宣称找到了解剖学意义上的“经络”系统,发现了人体的“第十个功能系统”。后世学者努力将“经络理论科学化”,其思路是一百多年前开始的。这位同情中医的“医学传教士”,就是德贞(John Hepburn Dudgeon, 1837-1901)——哈维《心血运动论》的中文翻译者。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的《德贞传》(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9年)向我们详细叙述了一个非凡的故事,提出了很多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打发过去的问题,令人深思。

《德贞传》提到了传主对于中医“脉理”的看法,很是典型。例如,一八七四年,德贞在《中西闻见录》上发表《脉论》,他对中医靠把脉诊断女子是否怀孕,是持批判态度的。他

批评庸医们常常误诊,误用药方,以致胎儿和孕妇一起毙命。但是,留华日久,见闻愈多,德贞发现中医“脉学”常常是有效的,连宫中太后是否怀孕,“太医”们都是用脉理来判断的。一八九〇年,德贞在《万国公报》上发表《脉理论》,在提倡西医的同时,也肯定中医“脉学”,他说:“唯有一脉,西医却无华医之神妙。即妇人怀孕按脉,即知其真系怀孕与否,究不知其理从何得者也。”还有,在早期发表的《脉论》中,德贞试图用西方现代医学的“心血运动论”来解释中医的“气脉”学说。但是在后期的《脉理论》中,德贞说:“按西医所论之脉理,以较华医所论之脉理,只有附会之说,而无确实之证也。”高晞指出:“几十年的观察和研究,他对中医脉学的认识较二十年前有所改变。”(第289页)“改变”就在于:德贞固然提倡现代医学,但他不全盘否定传统中医;德贞主张中西脉学比较研究,但他反对把两者牵强附会起来。中西医学,有各自的传统和价值,可以并存,可以互补。这样的包容态度,今天看来是平正公允的“文化正确”,但在十九、二十世纪“科学主义”全盛的时代,却是罕见。在二十世纪的“中西医之争”中,这种“保守主义”的态度,显得很突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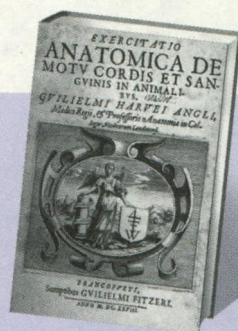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思想家反传统,自我批判,主张“西化”。外国学者也是出于对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,借鉴东方,认可中国,用他们的“汉学”(sinology)来肯定中国。中西之间这种“逆向肯定”的现象,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很明显。明清以降,我们看到很多肯定中国传统的外国人:利玛窦等早期明清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就不说了,德贞前后,卫三畏、理雅各、古德诺、庄士敦、辜鸿铭等“汉学家”,都是中国文化的“保守派”;林乐知、李提摩太、

丁韪良、傅兰雅等“洋顾问”，在批评清朝因循的同时，还给中国传统文化指出生路。德贞是中国“西医”的鼻祖，以某些国人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的种族主义心态来揣测，他应该排斥和打压“中医”才是。十九世纪，西方医学进步神速，中医望尘莫及，德贞完全可以借势主张“全盘西化”，取中医而代之。然而，德贞没有这么简单地对待中医，他主张中西医携手，共建近代医学，这样的“现代化”，在革新、进步和发展的同时，既尊重传统，又更新传统，是一种“和解”的理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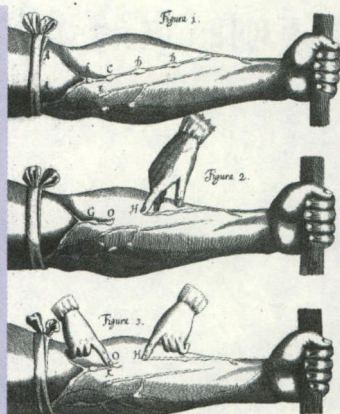
按德贞这样的“西医”来看，“中医”不一定是“西医”的反动，“传统”不一定和“现代”对立。推广来说，中西文化之间，“东风”、“西风”不必互相“压倒”，社会“进步”，也未必要靠“革命”来实现。凡事不必对着干，跨文化运动中一样需要“中庸”的态度，否则也是“过犹不及”。虽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，在十九、二十世纪的话语氛围中却非常稀少，迫切需要。德贞一八六三年来中国，到一九〇一年去世，在北京生活了近四十年，他一生的职责是传播现代医学，但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却是越来越“保守”。一八八四年，德贞在英国伦敦国际健康展上发表论文《中国人与健康相关的食、衣、住》；一八九五年，在北京《东方学会刊》上发表论文，讨论“中国的饮料”（论证茶叶和卫生）、“功夫和医学健身”（介绍道教与健康），都是在肯定中国的医学和卫生。几十年里，他在国际社会散布一个观点，说北京是世界上卫生习惯最好的城市，比当时的伦敦、巴黎、上海等现代都市的发病和死亡率更低，同阶层的市民中，卫生状况更好，“中国最高级的城市就是北京”（第396页）。这个观点雷倒了很多人，大家嘲笑德贞在北京住得太久，被朝廷洗脑了，看问题糊涂了。其实，

德贞医生很清楚北京之“脏”。在北京，男人在街上大、小便，粪便靠掏粪工人背出城外，“没有专人负责公共街道的清理、打扫，不存在任何公共意识，每个人都把街道当作各种各样污秽物的容器。”但是，德贞说的是另一回事情，是在谈中国城市传统好的一面：“西方是将城市最好的面貌都展现在公共的街道上，狭窄的里弄、巷子、小路与死胡同大部分都隐藏在视野所及之外，”卫生条件并不好，也很污秽。相反，德贞到北京的胡同和庭院里串门，“四合院”在水、空气、废物的处理，以及空间安置方面做得相当卫生。虽然北京的“公共卫生”很糟糕，但“家庭卫生”、“个人卫生”习惯却是更好。一个外国人，不老是厌弃和批评对方的坏传统，而是从正面发掘对方的好传统，当然是一个比较可取的“中庸”态度。

“东方和西方的和解”，这是我们时代的重要话题。其实，在尊重中国文化传统上，近代以来的西方学者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很少西方学者会情绪化地全盘否定中国文化。虽然他们确实是希望中国更进步、更科学、更民主、更人权，但对于“文化”和“传统”，他们很少横加批评。在这方面，德贞提供了很好的案例，《德贞传》则作出了很好的解释。生长在苏格兰，在动乱的中国住了近四十年。他和曾纪泽等开明的中国人交朋友，和李鸿章、崇厚、荣禄等洋务大臣有关系。他谴责西方商人的鸦片贸易，帮助中国人戒除缠足恶习。他去欧洲介绍中国的养生和卫生理论，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文化的“归化者”。德贞一生的言行，和不少来华传教士宣称的那样，是来成就中国文化，而不是败坏中国文化。《德贞传》告诉我们，德贞一到中国，“就对中医知识充满兴趣”，“研究中医古籍，发现疾病的起源和中医的治疗方法，



《心血运动论》(英文版)



《心血运动论》插图

由中医经典和传统习俗中寻找解释, 提供给西方世界引做作参考。”(第 397 页) 这样的德贞, 当然是一位和中医“和解”了的“文化调人”。

一八七三年, 德贞用中文作了一篇《哈斐论》, 发表在《中西闻见录》上, 第一次在中国翻译英国医生哈维 (William Harvey, 1578-1657) 的《心血运动论》(De Motu Cordis, 1628)。《心血运动论》揭示了“人体小宇宙”的奥秘, 和哥白尼《天体运行论》揭示“天体大宇宙”的奥秘一样, 哈维的著作也是近代科学的奠基之作, “科学革命”正是从这里开始。读高晞《德贞传》的同时, 正好读到美国“图腾丛书”收入的平装本图书《哈维的心脏: 血液循环的发现》(Andrew Gregory, *Harvey's Heart, The Discovery of Blood Circulation*, Totem Books USA, 2001)。书中谈到欧洲人在“中世纪”(14 世纪前)、“文艺复兴”(14-16 世纪) 和“科学革命”(16-19 世纪) 三个历史时期中对待“传统”的不同态度。作者说: “‘文艺复兴’和‘中世纪’泾渭分明, ‘中世纪’缺乏乐观和进步的观念; ‘文艺复兴’和‘科学革命’也判然不同, ‘科学革命’总是

想全盘地抛弃古代, 用一些新玩意来取代古人。”(第 24 页) “中世纪”拘泥古人, 迷信古代, 不能进步; “科学革命”又太不顾及传统, 只重未来。按这个通俗的表述, 作者认为中间状态的“文艺复兴”比较好, 比较平衡, 比较中庸。“文艺复兴”像是一只双头鹰, 一面朝向古代, 一面朝向未来, 既尊重传统, 又进步发展。作者说: 哈维采取的正是“文艺复兴”态度, 他的“心血运动论”, 不是凭空发明的, 而是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理论中改造而来的。哈维医生, 以及西方医学, 并不全盘否定传统。

德贞同情和理解中医, 尊重和善待中国文化的态度, 和他翻译和理解哈维学说有关系, 和他们“文艺复兴”式的学术立场有关系。德贞把中医和中国文化当作人类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一种, 因而表现出应有的尊重。他说西方医学在中世纪也拘泥于古人。中医只要发扬优点, 修正错谬, 照样能够进入现代医学。德贞, 这位“中西医调人”, 对我们今天还在延续的“中西医之争”, 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“科学主义”的正负面, 应该是会有所帮助的。